

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分析

李嘉伟

南京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江苏 南京

收稿日期: 2026年3月19日; 录用日期: 2026年4月1日; 发布日期: 2026年6月15日

摘要

近年来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迅速, 有效改善农村金融服务与资源配置, 促进农民增收。本文基于2011~2022年全国31个省级行政区的面板数据, 借助北大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构建模型进行实证检验, 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民增收存在显著正向影响, 并通过提升金融服务可得性、丰富金融产品供给等渠道发挥作用。研究结论可为相关政策制定提供一定的价值参考。

关键词

数字普惠金融, 农村居民收入, 影响机制, 经济发展

Impact Analysis of Digital Financial Inclusion on Rural Household Income

Jiawei Li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Nan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Received: March 19, 2026; accepted: April 1, 2026; published: June 15, 2026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China has witnessed rapid development in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which has effectively improved rural financial services and resource allocation and promoted farmers' income growth.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31 provincial-administrative regions in China from 2011 to 2022,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model with the help of the Peking University Digital Inclusive—Finance Index for empirical testing. The results show that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farmers' income growth and exerts its influence through channels such as enhancing the availability of financial services and enriching the supply of financial products. The research findings can provide valuable references for the formulation of relevant policies.

Keywords

Digital Universal Financial, Rural Resident Income, Influence Mechanism, Economic Development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1.1. 研究背景

当前我国经济正处于高质量发展阶段，城乡发展不均衡问题突出，农村金融供给短缺、资源配置不合理，仍是制约农民增收与乡村发展的重要瓶颈。数字普惠金融依托技术优势打破了传统金融在地域与成本上的约束，为改善农村金融困境、助力乡村振兴提供了重要方向。在此背景下，深入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民收入的影响、传导机制与区域差异，对健全农村金融体系、拓宽农民增收路径、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价值。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数字普惠金融的增收减贫效应是金融与农村经济研究的核心，其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广受学界关注。现有研究围绕二者关系形成了丰富成果，但存在内生性处理不严谨、机制检验缺乏实证、研究视角单一等不足，为本文研究提供了拓展空间。国外对普惠金融与收入增长的研究起步较早，为数字普惠金融相关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Gulli (1998)率先探讨普惠金融的扶贫价值，指出其能突破传统金融信贷壁垒，将服务覆盖至贫困群体，提升低收入群体经济活动参与效率，进而推动收入增长[1]。Claessens (2006)将普惠金融减贫增收效应划分为直接与间接两类，提出直接效应体现为小额信贷等金融服务的直接供给，间接效应通过提升就业率、优化收入分配实现，为后续机制分析提供了经典框架[2]。随着数字技术与金融的融合，国外研究进一步证实，数字技术能降低金融服务运营与交易成本，突破地理限制，提升金融服务可及性，为农村低收入群体提供平等的金融参与机会，这也成为国内外研究的共识。

国内学者结合中国实践，围绕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展开大量本土化实证研究，均证实二者存在显著正向关联，且研究视角不断丰富。在直接影响效应方面，吴培芸等(2022)利用2011~2022年省级面板数据证实，数字普惠金融能缓解农村金融排斥，为农民生产经营提供资金支持，推动收入提升[3]；马妍(2022)的研究也得出相似结论，并指出其能同步推动农村产业结构优化。在异质性与非线性影响方面[4]，王永仓(2021)发现二者存在门槛效应，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跨越阈值后，增收效应呈边际递增特征[5]；郭润婷等(2024)揭示了区域异质性，认为东中部地区的增收效果显著优于西部地区[6]。在空间效应方面，陈鸣等通过空间计量模型证实，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非农业收入存在显著空间溢出效应，能通过区域间金融资源流动与产业联动带动周边农民增收[7]。总体而言，国内研究已从单一效应检验逐步向异质性、传导机制分析延伸，为本文提供了重要实证参考。

现有研究虽较为丰富，但仍存在多处不足：一是内生性处理不够严谨，部分研究未充分考虑双向因果与遗漏变量问题，易造成估计偏误；二是作用机制多停留在理论阐释，缺少严格的实证检验，对农村创业、消费平滑等传导渠道研究不足；三是多使用综合指数开展分析，未拆分维度探究异质性影响；四是区域差异研究不够深入，对成因挖掘不足，政策参考价值有限。对此，本文从以下三方面予以完善：

一是采用滞后变量法缓解内生性，并通过缩尾处理、剔除直辖市样本的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二是构建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农村创业、产业升级、消费平滑等传导机制；三是将指数拆分为覆盖广度、使用深度与数字化程度分别回归，并结合地区差异剖析成因，为制定差异化政策提供支撑，丰富相关研究成果。

1.3. 研究内容

数字普惠金融是数字技术与普惠金融深度结合的产物，其以创新性的融合方式，为传统金融服务领域注入了强劲的增长新动力，极大地拓宽了金融服务的覆盖范围与深度。本文基于国内外研究的最新动态，并结合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背景，对数字普惠金融在农民收入增长方面的影响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探讨。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的蓬勃发展为优化农村金融体制和改善金融服务环境提供了有力支持，有效缓解了其存在的痛点问题，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激励作用。

1.4.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图

1.4.1. 研究方法

1. 文献分析法：通过多平台检索梳理国内外相关文献，总结现有研究的思路与领域，为本文的理论分析奠定基础。

2. 数据分析法：本文利用《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分析当前农村居民的收入状况，进而从整体上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的影响。

3. 实证研究法：本文基于北京数字普惠金融指数，通过构建分析模型，对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的实际影响进行深入的实证分析。

1.4.2. 技术路线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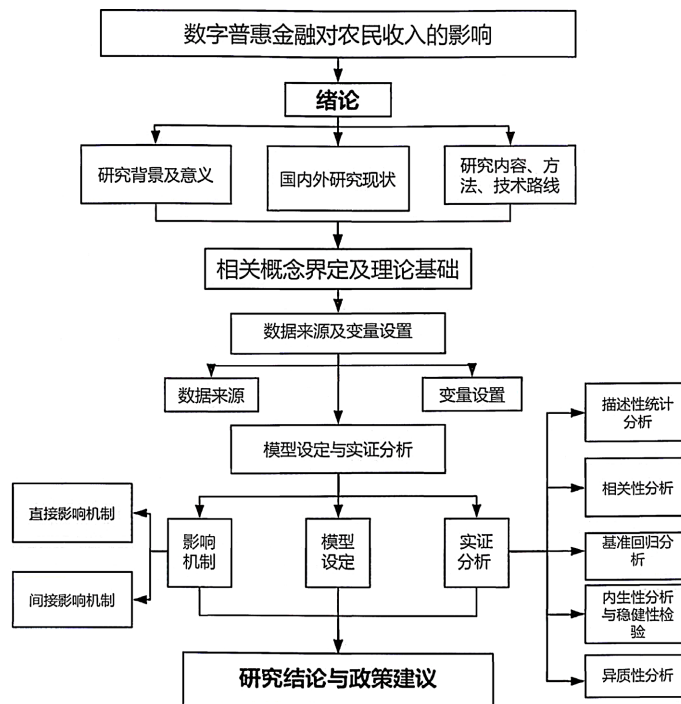


Figure 1. Technology roadmap
图 1. 技术路线图

2. 理论基础与影响机制

2.1. 理论基础

2.1.1. 金融排斥理论

金融排斥理论由 Leyshon & Thrift 在 1995 年提出，它是指部分群体会因地理、经济、知识等因素被传统金融体系排斥。农村低收入群体受金融排斥问题尤为突出，制约了农村发展与农民增收，而数字普惠金融正是缓解这一问题的重要路径。可作为本文研究的重要理论依据[8]。

2.1.2. 包容性增长理论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不少发展中国家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贫困与城乡差距问题愈发突出，社会矛盾加剧。包容性增长理论正是针对这一现象，强调增长机会均等，让全民共享发展成果。该理念与数字普惠金融高度契合，二者均注重公平与普惠。数字普惠金融通过向农村群体提供均等金融服务，优化城乡金融资源配置，成为推动包容性增长的重要支撑。

2.1.3. 长尾理论

这一理论由克里斯·安德森提出，核心是互联网技术降低了交易成本，使得原本被忽视的小众需求能汇聚成可观的市场规模。该理论为农村金融发展提供新思路，数字普惠金融依托数字技术聚焦农村“长尾客户”，打破传统金融的服务边界，降低农村金融服务成本，提升服务效率与可及性，体现普惠金融的核心内涵[9]。

2.2. 影响机制

2.2.1. 直接影响机制

(1) 降低金融服务的门槛从而缓解金融排斥效应

移动互联网、大数据等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为普惠金融发展提供了新契机，显著提升了金融服务可得性。移动互联网的普及降低了农户获取金融服务的成本与门槛，激发了其使用意愿，同时拓宽了服务覆盖面，将农户纳入金融服务体系，有效缓解农村金融排斥，保障了农户金融服务权益，也为农民增收创造了条件。

(2) 提供多样化的金融服务促进农村居民增收

数字普惠金融融合数字技术与金融服务，创新推出互联网理财等服务形式，丰富了金融供给。其不仅能为农村低收入群体提供基础保障、提升资金使用效率以助力增收，还能整合多方数据，依托数字技术精准匹配农户金融需求，增强农业保险等服务的针对性，提升农户金融参与度，推动其收入稳步提升。

(3) 降低金融服务成本来扩大农村居民享受金融服务的范围

数字普惠金融凭借创新与高效的特点，大幅降低了金融服务成本，能为农村贫困群体提供更高效、均等的金融服务，打破了传统金融在成本和服务范围上的限制，有效解决了农村金融服务供给不足、成本偏高的问题[10]。数字普惠金融在农村的普及，可以有效降低农户获取金融服务的成本、提升群众参与积极性、扩大了服务覆盖面，使低收入群体也能获得资金支持以拓宽发展渠道、实现增收减贫，为农村经济持续发展提供动力。同时，它缓解了农村小微企业融资难题，带动就业增长，帮助低收入群体改善生活。此外，依托智能终端延伸服务边界，数字普惠金融还促进农户加大在教育、医疗等方面的人力资本投入，提升自身能力，更好地利用金融工具开展生产经营、实现增收。

2.2.2. 间接影响机制

(1) 经济增长效应

传统金融依靠线下网点与人工服务，资源配置存在明显局限，易导致金融服务区域分布不均，低收

入群体难以平等获得金融支持，不利于经济均衡发展。因此，金融机构需加快数字化转型，以高效便捷的服务扩大覆盖范围。数字技术与普惠金融的融合，能优化金融资源配置、降低服务成本，在激发社会财富增长的同时，有效提升农村居民收入，助力经济平稳发展。

(2) 收入分配效应

数字普惠金融以低成本、高效率与强风控的优势，切实改善了农村与城镇低收入群体的金融服务条件。它既降低了服务供需成本，又通过产品创新提供差异化、个性化金融服务，打破了传统金融产品同质化局限。同时，其面向农村低收入群体构建的高效服务模式，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优化收入分配，为农民创造更多增收机会，提升收入水平并推动农村经济发展。

3. 数据来源与变量设置

3.1. 变量选取

综合考量数据的可靠性，本文选取了全国 31 个省(直辖市、自治区) 2011~2022 年的面板数据作为本文实证分析的核心数据(由于数据的可得性原因，本文研究不包含我国港澳台地区的样本数据)，并将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作为被解释变量、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水平作为主要解释变量。同时，为确保模型的全面性和准确性，我们还将产业结构、政府财政支出、城镇化率以及对外开放程度等关键因素纳入考量，并作为控制变量加以分析。为了保证研究的严谨性和数据的可得性，本文研究的时间控制在此范围内。根据研究的结果实证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民收入的影响。

3.2. 数据来源

3.2.1. 被解释变量

本文在参考相关文献的基础上，选定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作为被解释变量，具体以 2011~2022 年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作为衡量指标。这一关键数据来源于权威的《中国统计年鉴》，并在文中统一记为 Y。

3.2.2. 核心解释变量

本文选取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作为核心解释变量，并采用郭峰等[11]提出的方法进行衡量，记为 DIFI。这一数据来源于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具有较高的权威性和准确性。

3.2.3. 控制变量

控制变量参考孙天怡(2023) [12] 等的方法，以下为选取的变量：

产业结构(记为 IS)，用第三产业产值占第二产业产值比重来衡量。财政支出水平(记为 GOV)，本文财政一般预算支出占地区生产总值来衡量。城镇化水平(记为 URB)，城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能优化产业结构，带动农业的发展，从而有利于提高农民收入。以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来衡量。对外开放程度(记为 OPEN)，用年度进出口总额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来衡量。在通常情况下，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对外开放程度越高，其农民获取收入的途径则越为多样化。因此，我们可以推断出，对外开放的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对农民的收入水平产生着显著的影响。变量数据均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研究的时间范围为 2011~2022 年。

4. 模型设定与实证分析

4.1. 模型设定

为研究 2011~2022 年我国 31 个省(直辖市、自治区)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收入的影响机制，本研究采用了丰富的面板数据作为分析基础。在这些面板数据的基础上，我们构建了面板数据模型，并借助严

谨的实证研究方法，深度剖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民收入产生的实质性影响。本文在撰写过程中充分借鉴已有研究模型设定方法，并在此基础上紧密结合研究主题，同时构建了相应的回归模型：

$$Y = \beta_0 + \beta_1 DIFI_{it} + \beta_2 URB_{it} + \beta_3 GOV_{it} + \beta_4 IS_{it} + \beta_5 OPEN_{it} + \varepsilon_{it}$$

其中： i 表示各省， t 表示年份， β_i 为代估参数， ε_{it} 为随机扰动项， Y 表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DIFI$ 表示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URB 表示城镇化水平， GOV 表示财政支出水平， IS 表示产业结构， $OPEN$ 表示对外开放水平。

4.2. 实证分析

4.2.1. 描述性变量统计分析

在考察被解释变量时，我们注意到我国农村居民人均实际可支配收入的平均值为 13,847，但数据分布呈现出显著的不均衡性，其中最大值达到 39,729，而最小值仅为 4,278。这种显著的收入差距凸显了我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不均衡现象。

解释变量是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其平均值为 242.9，这表明我国数字普惠金融整体发展呈现出适中水平。然而，指数的最大值高达 460.7，最小值仅为 16.22，这说明数字普惠金融在我国不同地区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发展水平差异。

从控制变量来看，产业结构(IS)、对外开放程度(OPEN)的最大值与最小值之间展现出了显著的差异；相对而言，财政支出水平(GOV)、城镇化水平(URB)的最大值最小值之间的差距则相对较小。表 1 即本文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Table 1. Variable definitions and descriptive statistics

表 1. 变量含义及描述性统计

变量	含义	样本量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Y	农民可支配收入	372	13,847	6296	4278	39,729
DIFI	普惠金融指数	372	242.9	107.6	16.22	460.7
URB	城镇化率	372	0.592	0.13	0.228	0.896
GOV	财政支出水平	372	0.286	0.206	0.107	1.379
OPEN	开放水平	372	0.245	0.282	3.37E-05	1.548
IS	产业结构	372	1.125	0.644	0.494	5.297

4.2.2. 相关性分析

为确保回归分析结果的准确性和可靠性，本文在开展回归分析之前，首先对研究所涉及各个变量进行了相关性检验，以深入探究它们之间的关联程度。通过详细分析表 2 中的数据，我们发现这些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呈现出正负不一的情况。然而，所有相关系数的绝对值均保持在 0.789 以下，且没有一个超过 0.8 的阈值。基于这一观察，我们有理由认为，这些变量之间不存在显著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Table 2. Results of correlation analysis

表 2. 相关性分析结果

Y	DIFI	URB	GOV	OPEN	IS
Y	1				
DIFI	0.789***	1			

续表

URB	0.765***	0.497***	1			
GOV	-0.283***	-0.131**	-0.505***	1		
OPEN	0.437***	0.0310	0.671***	-0.278***	1	
IS	-0.0670	-0.0220	-0.0840	0.0760	-0.00500	1

4.2.3. 基准回归分析

本文利用 stata17.0 软件, 根据前文的相关变量定义和模型框架, 本研究通过回归分析深入探讨了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村居民收入之间的潜在关联。这一分析旨在揭示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 并为相关政策制定提供一定的价值参考。

从表 3 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来看, 财政支出水平(GOV)、对外开放水平(OPEN)、城镇化水平(URB)与农民收入存在负相关关系, 这一发现似乎与既有理论预期相悖。对此, 有可能的解释是: 在财政支出中, 尽管存在对农业领域的投入, 但这些投入可能并未充分满足农民在农业生产中日益增长的需求, 从而导致了农民收入的负向影响; 对外开放水平(OPEN)与农民收入呈负相关可能是因为随着时代的发展, 对外开放企业对劳动力质量的要求不断提升, 越来越多的农民因自身的条件无法达到对外开放企业的要求, 这会使得农民在对外开放企业中的增收渠道更少, 从而使得农村居民从中增收较少。产业结构(IS)与农民收入呈正相关且所有控制变量均呈现出显著的影响, 这也说明了这些控制变量在影响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方面均发挥着不容忽视的作用。

Table 3. Regression results of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and farmers' disposable income

表 3. 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民可支配收入的回归结果

	Y
普惠金融指数(DIFI)	72.0242*** -9.893
城镇化水平(URB)	-38,158.56*** (-10.222)
财政支出水平(GOV)	-405.172 (-0.310)
对外开放水平(OPEN)	-2589.574*** (-2.887)
产业结构(IS)	77.2429 -0.601
_cons	1.96e+04*** -6.98
省份	Yes
年份	Yes
N	372
Adj. R ²	0.986

4.2.4. 内生性分析

上述实证分析明确指出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的收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是，不容忽视的是，由于内生性问题的潜在影响，这一正向效应的实际影响作用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被低估。为了确保结论的严谨性和准确性，研究需要更深入地探讨并处理这些内生性问题。一方面，数字普惠金融的蓬勃发展极大地减少了金融排斥现象的发生，为农村居民提供了更广泛的就业机会，在进一步推动了产业升级的同时优化了收入分配结构，这些综合效应共同作用于农民收入，从而显著促进了农民增收和生活水平的提升。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也可能反过来影响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水平。这种双向的相互影响关系可能对回归估计的结果造成一定的偏差。另一方面，仍然存在的一些不可控或无法直接观测到的因素，它们可能同时作用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和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这些遗漏的变量可能会对模型估计的系数产生偏差影响。为了克服上述内生性问题，本文采用了滞后解释变量的方法。具体做法就是利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数据分析，检验滞后一期的解释变量对当年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影响。从表 4 的数据可以看出，滞后的解释变量的系数方向和显著性水平并未发生明显的变化，这也充分验证了基准回归研究结果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Table 4. Regression results with one-period lagged explanatory variables

表 4. 滞后一期解释变量结果

	滞后解释变量 Y
L.DIFI	72.452*** (8.28)
L.IS	-31.556 (-0.21)
L.OPEN	-2107.924*** (-2.76)
L.GOV	-968.403 (-0.69)
L.URB	-39,240.112*** (-12.40)
常数项	45,782.909*** (18.95)
样本量	341
调整 R ²	0.986

4.2.5. 稳健性检验

为了保证实证结果的可靠性，本文在表 5 中采用以下几种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

第一，缩尾处理。为了提升数据的稳健性并削弱极端值对研究结论的不利影响，本文首先对收集的数据进行 5% 的缩尾处理，随后基于处理后的数据，再次运用基准回归模型进行分析，以确保研究结果的科学性和准确性。具体的分析结果见下方表格。经过缩尾处理后的结果依然为正，且显著性水平也未发生变化，这说明研究结果具有稳健性和可靠性。

第二，剔除直辖市样本。考虑到直辖市在经济水平与基础设施条件上与普通省份差异较大，可能对

实证结果产生干扰，本文在数据分析时剔除了直辖市样本。随后通过固定效应模型开展稳健性检验，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的回归系数仍显著为正，验证了基准回归结果的可靠性。

Table 5. Robustness analysis results

表 5. 稳健性分析结果

	缩尾处理 Y	剔除直辖市样本 Y
DIFI	66.451*** (10.32)	69.505*** (7.30)
IS	107.748 (0.57)	46.961 (0.32)
OPEN	-1970.064* (-1.80)	-3505.501** (-2.15)
GOV	3576.153** (1.97)	623.302 (0.46)
URB	-16,299.842*** (-4.97)	-29,225.544*** (-5.64)
常数项	23,707.818*** (8.33)	19,306.938*** (8.70)
样本量	372	324
调整 R ²	0.981	0.979

4.2.6. 区域异质性分析

表 6 呈现了数字普惠金融对东、中、西部农村居民收入的异质性影响结果。东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系数为 119，通过 1%显著性检验，对农民增收具有显著正向推动作用；中部地区系数为 0.197，虽为正值，但影响效果不显著；西部地区系数为 29.431，通过 5%显著性检验，增收效应介于东、中部之间。综上，数字普惠金融对三大区域农民收入均存在正向影响，但影响程度与显著性存在明显区域异质性。

Table 6. Heterogeneous effects regression results

表 6. 分区域回归结果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DIFI	119.011*** (8.88)	0.197 (0.03)	29.431** (2.61)
IS	-93.395 (-0.31)	-69.872 (-0.54)	258.586*** (2.73)
OPEN	-228.550 (-0.21)	-1703.497 (-0.78)	-2800.477** (-2.53)
GOV	4542.103 (0.93)	-3911.812** (-2.37)	-3352.351** (-2.55)

续表

URB	-33,896.245*** (-5.55)	13,731.942** (2.03)	-20,221.536*** (-3.75)
_cons	31,753.650*** (6.06)	-369.956 (-0.11)	18,459.419*** (5.61)
控制行业	YES	YES	YES
控制年度	YES	YES	YES
N	144	108	120
r2_a	0.985	0.992	0.982

导致这种区域差异的原因主要在于：东部经济发达、产业与基建完善，农民收入稳定，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提供了良好基础，因而增收效应最强。西部受地理条件、教育水平、信息基建与金融素养制约，发展条件弱于东部，但整体效果仍优于中部。中部地区相关支撑条件不足，导致数字普惠金融增收效应最弱。总体有东部最强，西部次之，最后是中部，呈现出明显的区域异质性。

5.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5.1. 研究结论

本文基于 2011~2022 年我国 31 个省(直辖市、自治区)面板数据，构建固定效应模型。在文献梳理、理论与机制分析基础上，探究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民收入的内在关联。实证结果进一步验证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民增收的显著作用，基准回归结果稳健可靠。最终得出以下结论：

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意义重大，能有效提升乡村发展水平，为农村经济增长提供新动能。因此，强化乡村地区数字普惠金融支持，对促进农民增收、改善农村经济面貌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5.2. 政策建议

基于前述实证分析的结果和深入研究的结论，为促进我国普惠金融整体水平的发展，并进一步完善数字普惠金融体系，本文提出以下策略建议。

5.2.1. 推进数字信息化并加强农村地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

加快补齐农村数字普惠金融硬件短板。农村基础条件薄弱，数字金融可依托技术突破地域限制，为农户提供高效服务。政府需加大基建投入与政策补贴，引导通信企业完善偏远地区信息网络；同时鼓励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提升对农村群体的服务能力，推动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发展。

5.2.2. 加强数字普惠金融相关知识的普及和教育

农村及偏远山区居民受教育水平与金融知识有限，对数字普惠金融认知不足，亟需开展相关知识普及。提升农民金融素养，不仅能增强其理财能力、优化数字普惠金融落地成效以促进增收，还能帮助农户通过运用数字金融工具拓宽增收路径，因此培育农民金融素养是农村发展的迫切需求。

5.2.3. 构建完善的数字普惠金融体系并加强监管

完善农村数字普惠金融体系，应统筹服务网络、产品创新与制度建设。政府可通过专项政策扶持农村金融机构，缩小城乡金融差距，健全法律监管与信用考核体系，引导金融科技下沉，精准对接农户金融需求。同时加强网络安全与风险防控，严厉打击金融欺诈，构建全流程信息安全机制，切实保障农民

财产与信息安全。

参考文献

- [1] Gulli, H. (1998) *Microfinance and Poverty: Questioning the Conventional Wisdom*. IDB Publications.
- [2] Claessens, S. (2006) Access to Financial Services: A Review of the Issues and Public Policy Objectives. *The World Bank Research Observer*, **21**, 207-240. <https://doi.org/10.1093/wbro/lk1004>
- [3] 吴培芸, 祝思婷. 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民收入影响的实证分析[J]. 现代金融, 2022(12): 9-16.
- [4] 马妍.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J]. 投资与创业, 2022, 33(17): 29-33.
- [5] 王永仓. 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门槛效应研究[J]. 金融理论与实践, 2021(6): 94-109.
- [6] 郭洵婷. 数字普惠金融对促进农户增收的有效性研究[J]. 当代农村财经, 2024(2): 2-8.
- [7] 陈鸣, 陈峰, 廖世伟. 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村经济增长: 空间溢出机制与经验证据[J].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 2022, 24(6): 14-27.
- [8] Leyshon, A. and Thrift, N. (1995) Geographies of Financial Exclusion: Financial Abandonment in Britain and the United States.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20**, 312-341. <https://doi.org/10.2307/622654>
- [9] 漆铭. 商业银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策略研究——基于长尾理论的视角[J]. 金融纵横, 2019(4): 35-41.
- [10] 潘锡泉. 数字普惠金融帮扶低收入群体的逻辑机理及实现机制[J]. 区域经济评论, 2019(4): 143-149.
- [11] 郭峰, 王靖一, 王芳, 等. 测度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 指数编制与空间特征[J]. 经济学(季刊), 2020, 19(4): 1401-1418.
- [12] 孙天怡. 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J]. 黑龙江粮食, 2023(2): 126-128.